

# 嵌入与重构:乌热尔图创作转型研究

陈 珏

**内容提要:** 乌热尔图的创作在新世纪出现转型,由早期从族群口头传统汲取营养的虚构写作到重新书写族群历史,这一转型背后直指族群的文化记忆问题。这种重建传统以展望新局、借以返本开新,于文化多元共生局面的形成是积极有益的。

**关键词:** 乌热尔图 创作 转型 文化记忆

1984年第3期《人民文学》上,刊登了李陀与乌热尔图的创作通信,在《致乌热尔图》的信中,李陀写到:

你笔下的鄂温克是一个只有一百多人的部落。……它虽然有十分丰富多采的口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传统,却由于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因此一直未能产生以文字语言为表现手段的“正规”的文学。这使你拿起笔来进行写作时一定感到极其困难。你生身于一个根本没有小说传统的民族。你不得不用汉语写作,向汉族文学和世界各国文学进行广泛的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以为你至今所创作的为数不是很多的小说却是地地道道的鄂温克族文学。……因为你的小说深深地植根于鄂温克族的民族生活,这个很小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宗教意识、民族心理等等,都在你的小说中得到了相当细致、准确的描绘和表现。你是鄂温克族的第一位作家。但是你的创作无疑使鄂温克文学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sup>①</sup>

诚如李陀所言,没有文字的鄂温克族,自始依循的是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方式,口传文学的繁荣自不待言。族群的历史文化在口传文学的重述与诵唱中,由长者传给下一代。随着社会变迁,传统的“口传”途径日渐式微,传承族群文化的耆老终有辞世之日,年轻一代对呈现部落悠久历史文化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淡忘,使得传统的狩猎文化在现代文明社会里

---

<sup>①</sup> 李陀:《致乌热尔图》,《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

面临消解的危机。乌热尔图多次述及传统消失、传承不再的焦虑<sup>①</sup>,并寻索接续传统之路。

### 精神原乡:口头文学与书面叙事

神话作为前逻辑时代的文化现象,透过诗意化的表达展示古人的智识,这种智识不是条缕分明的,而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想象,是懵懂混沌的状态,也就是叶·莫·梅列金斯基说的神话的“浑融性”<sup>②</sup>,正因其浑融性,谢林在《艺术哲学》中将神话视为一切艺术的元素、土壤和范型<sup>③</sup>,是“永恒的质料”。文学与神话的亲缘关系,使神话在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成为重要的营养基原,远如古希腊罗马文学,近如20世纪文学领域的神话主义,神话被视为是表现某些“永恒的”心理因素和“稳定的民族文化模式的手段”<sup>④</sup>。

无文字的现实形塑了鄂温克族丰富发达的神话及其他形式口传文学,这些口传文学往往跟部族起源记忆、迁徙历史紧密相连,因此是鄂温克族历史记忆的重要传承依据,其中衍引出来的习俗之内涵,是鄂温克民族精神的源泉,是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的“重要的文化力量”<sup>⑤</sup>。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鄂温克族传统的口传文学正失去其传播途径而渐渐被人们淡忘,而它所蕴含的古老的狩猎文化也将面临解体。作为人口只有两百多人的使鹿鄂温克的第一位作家,乌热尔图认识到传统口传文学对于维系古老狩猎文化血脉的重要性,因此在题材选择上,自觉扎根于民间,以神话传说等民间口传文学滋养书面创作,显影民族图像。

乌热尔图较早发表的儿童文学集《森林骄子》(与黄国光合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其中不少篇什即是在本民族神话传说故事基础上加以改写的成果。《森林骄子》以第一人称游记的形式,描述森林调查队员“我”在大兴安岭遇险、被鄂温克猎人所救,而后在林中养伤日子中的所见所闻,通过15个故事,展现鄂温克族风貌,题材涉及鄂温克族族源及其演变、民间神话传说、古老风俗习惯等。在往后的作品中,乌热尔图不断让自己族群的口传文学反复出现,使其小说创作与母体文化紧密联系,以另一种形式传承族群文化。

《雪》<sup>⑥</sup>是吸收利用民间文学素材较多的一篇小说。小说讲述关于伦布列和申肯等人在伦布列猎场撵鹿的故事,在主人公申肯和伦布列的对话中,作者嵌入了不同类型的鄂温克口

① 在为《鄂温克族的起源》写的“序言”、《述说鄂温克》“致读者”部分,以及《我属于森林》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焦虑。乌云达赉:《鄂温克族的起源》,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乌热尔图编著《述说鄂温克》,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乌热尔图:《我属于森林》,《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4期。

② 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页。

③ 转引自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第13页。

④ 同上,第2页。

⑤ 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⑥ 乌热尔图:《雪》,载《你让我顺水漂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21页。

传文学,如流传甚广的讲述四只眼的鹿母为何变成两只眼的民歌《母鹿之歌》、关于火神的神话传说、猎人出猎崇敬山神的民间风俗、民间故事、童谣等等,这些不同题材的内容连同各自在语言修辞上的特征共存于同一文本中,使文本呈现出巴赫金所谓的“多语体”“杂语”<sup>①</sup>的特征,而正是在自己族群丰富的口传文学的馈赠下,乌热尔图用文字“记忆”祖辈传下的鄂温克族生活图像才显立体而丰满。

小说封笔之作《丛林幽幽》中,充满民族情感记忆的神话传说依然成为小说重要的素材。在鄂温克族神话中,萨满神话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占有重要的地位。鄂温克族世代信奉的萨满教,是由于萨满的出现而得名的<sup>②</sup>,萨满教没有经典教义,而是由萨满通过宗教仪式口传身授,关于部族的历史、生存经验等,也经由萨满之口而世代流传,这种口头传播的环境和途径,使萨满神歌、唱词成为鄂温克族口传文学重要的形式,而蕴含大量部族历史信息的古老神话传说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神话与宗教互为依傍,正如叶·莫·梅列金斯基所言,作为“浑融体”的古老神话,孕育着宗教的胚胎<sup>③</sup>,而宗教也反过来成为神话延续的重要场域。所以,当《丛林幽幽》中的托扎库萨满进入人神双体、如痴如狂的“疯癫”状态,当他的声音不再是自己“卑微”“恐惧”和“恭顺”的声音,而是“浑厚”“富有威慑力”的先祖的声音<sup>④</sup>,关于族群起源的神话,关于玛鲁神的信息,得以流传;而小说关于人熊大战,巨熊被人合力杀死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是鄂温克人远古图腾崇拜意识的唤醒,是对“父亲”威严的畏惧、追怀和崇拜。在这个意义上,《丛林幽幽》体现了乌热尔图最绝决、用力的“寻根”姿态:所寻的是文化之根,精神的原乡,伦理的子宫。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初入人文坛的略显稚嫩,八十年代中期的趋于圆熟,迨至九十年代初创作生命的最后喷发,部族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始终以它独特的“光彩、韵味、力度”<sup>⑤</sup>滋养着乌热尔图的书面创作。这些口传文学不仅仅在题材上是作家书面叙事的矿床,在技术上以各自不同文体的修辞特征丰富着文本的多元呈现;口传文学之于书面叙事更为重要的是精神的原乡。乌热尔图试图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构建起民族精神城堡,在这个精神世界里,表现的是鄂温克人的价值观、历史意识,强调的是鄂温克人的情感与痛苦,为此他使用从父祖辈传承下来的神话传说等口传文学、风俗习惯,以及他者眼中独特的鄂温克人的文化代码,充分利用这些构成鄂温克文化整体的要素,全面开掘久经沧桑的狩猎文化。

① 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3卷,钱中文、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② 孔繁志:《教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③ 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第1页。

④ 乌热尔图:《丛林幽幽》,载《你让我顺水漂流》,第210页。

⑤ 乌热尔图:《致李陀》,载《沉默的播种者》,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以“听觉文化”为特征的民族,无不以口述的部族神话、故事、传说,同步入发达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体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对于一个原始部族来说,没有属于自己的神话、故事、传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些为整个部族所共有的、涉及部族起源、创世神话、英雄传说、动物故事,大多指向一个目标——部族对世间万物(包括部族自身)的理解、阐释或探寻其源头。可以说那是以独特形式表达群体意识的“隐形文本”,其旨在阐释整个部族的精神世界,使其更具有凝聚力与部族意识,以便同其他生存群体相区别。<sup>①</sup>

鄂温克族的口传文学及蕴含其中的狩猎文化,随着生命的成长早已成为作家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充满民族情感的记忆,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以内涵的丰厚和可变,为书面叙事提供丰富的写作题材,使熟悉它的文学创作者,以从容与自信,构筑起与任何一种文化平等对话的、具有同等力量的文化堡垒。

### 新世纪的转型:从虚构到写史

如果说,难以尽数的部族神话、传说、故事、民歌等口传文学是乌热尔图小说创作话语的基原,是回答“我是谁?”这一亘古之谜的归宿;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对族群历史地理的考古则成了乌热尔图文化随笔的话语主题,回应着“我们从哪儿来?”这一源自心灵的叩问,并为鄂温克民族话语的重构创造了可能。转型,是力求突破自己的创作实践。

乌热尔图在《思索着前行》一文开头这样写到:“新的一年,新的世纪始于今天,它是昨天的延续,从人们的脚下延伸开去。”<sup>②</sup>“新的一年”指“2000年”。

对于“过去”的自觉思索,是乌热尔图进入新世纪后的重心,这些思考,直接呈现为2000年后他出版的一系列文化随笔如《呼伦贝尔笔记》(2004)、《蒙古祖地》(2006),以及更为专深的文史类读物如《鄂温克族历史词语》(2005)、《鄂温克史稿》(2007)。四年四部著作的速度,是乌热尔图对本族历史地理考古式梳理异常用力、倾心的佐证。“速度”源自挽救的努力。

乌热尔图认为:鄂温克族是一个内源性文化母体。“内源性”原是医学术语,与“外源性”相对,指由人体内部因素产生或引起的(疾病,物质等)。<sup>③</sup>鄂温克人生存的环境造成了这一民

① 乌热尔图:《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年第2期。

② 乌热尔图:《思索着前行》,《民族文学》2000年第1期。

③ 参见“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gFKLs1eT-wrKEK7EY9jODPjvWXtGBFLCzYuQfiK-IEHn7ZKr7S8oDsrBTvmFnbbogtM4dCXiWz0SPWQVdDaBfdq>,2011-11-02。

族文化先天的“内源性”特征:绵延的兴安岭如天然的屏障,既阻隔了鄂温克族与外界有形的联系,也阻隔了无形的时间的同一性,使其形成一个自足的、自我调节的内循环系统。“山河是一种慢”<sup>①</sup>,在漫长迟缓的岁月里,这一文化母体孕育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以及生活在高寒地带族群特有的民风民俗,在历史的长河中构筑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然而,这种散漫自发的文化现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大兴安岭被开发而停滞了,内在的平衡被打破,传统非但失去了创造力,更面临着延续的危机。

社会的“进步”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向前推进,转身留下一张冷峻苍白的脸。在强大的现代文明的生命力面前,传统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慢慢地被抛弃与遗忘,鄂温克人好像成为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废弃的人口”(wasted human)<sup>②</sup>,年轻一代纷纷离开山林投入现代文明的怀抱,老人们越来越少,口传的环境渐渐消失,那些蕴含族群生命密码的神话传说等口头文学连同背后的精神意蕴、共同情感、集体记忆,以惊人的速度一天天消亡;族群的历史也随着集体记忆的残缺不全而断裂成碎片,“我们从哪里来?”成了待解之谜。

重写历史,除了挽救的努力,还隐含了强烈的“述说”的渴望,这种“述说”的渴望,在乌热尔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随笔如《声音的替代》(1996)、《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1997)、《弱势群体的写作》(1997)、《发现者还是殖民开拓者》(1999)中便已显见。

受后殖民理论的启发,乌热尔图在《声音的替代》一文中借用白人文化对印第安人文化盗用、篡改和歪曲的话题,委婉指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里,不同民族间的文学交往也存在这些“并不多见、不常发生”的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占用问题,当然乌热尔图清楚这与殖民统治的“盗用”不同,遂用了较为和缓的“声音的替代”一语来表述这一类现象,认为“声音的替代”覆盖和抑制了某一民族的自我阐释权。<sup>③</sup>《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接续此类话题,以人类学领域著名的由跨文化交际引起的文化纠纷——米德对萨摩亚人文化的歪曲书写,反思萨摩亚人在这场纠纷中所具有的自身权利以及对权利的自我意识。乌热尔图认为,像萨摩亚人这些处于人类早期社会形态的以“听觉文化”为特征的部族,有一种本能的“不可遏制的述说的冲动”存在于整个部族的意识中,也就是说,在这些部族中自我阐释的愿望以及对这一权利的运用是自觉的,能证明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据便是那些关于部族起源的创世神话、英雄传说、史诗等,这些维系与凝聚部族意志的“隐形文本”,便是在这种“述说”权利的反复运作中创作出来,并继续以“述说”的形式存在并传播下去。<sup>④</sup>书不尽言,在《弱势群体的写作》一文中,乌热尔图以在白

① 青年作家焦虎三主编的“藏彝走廊丛书”,其中一本书的书名为《山河是一种慢》(重庆出版社,2007年)。我认为用来形容鄂温克人的生存状态甚为贴切。

② 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导言”,谷蕾、胡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③ 乌热尔图:《声音的替代》,《读书》1996年第5期。

④ 乌热尔图:《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年第2期。

人中心主义的社会里的黑人写作为例,再次强调了这种“自我阐释”的意识,文章从黑人写作所具有的自我阐释的特质,扩散至具有古老传统的群体,认为,“述说的渴望与以群体意识替代一切所构成的思维特征,成为富有古老传统的群体的文化特征,成为他们延续下来的关注群体命运的集体思维特征,甚至演化为自我保持机制沉淀在荣格所称的‘集体无意识’中”<sup>①</sup>。被压抑的述说的欲望,在这几篇接连发表的随笔中,一个比一个强烈;而不论是印第安人的状况、米德对萨摩亚人的描述,还是黑人写作,包括后来的《发现者还是殖民开拓者》中提及的哥伦布对美洲大陆及印第安土著的话语建构,其中的比照和暗示不言而喻。

事实上,在发表《声音的替代》之前,乌热尔图已经流露出“述说”的渴念。在停止小说创作后,他用了一年多时间,采访了十几位鄂温克族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以自述的形式追忆各自的人生以及与鄂温克民族整体相关的经历。这些以个人自传为主的录音或手稿,最后被编撰成集,乌热尔图在书的“致读者”部分,写下如下文字:

编撰本书的原初立意是想以接近于真实的形式,把握一个没有文字、人口总数二万余人的生存群体近五十年的演化轨迹,以便对其即将成为过去的一切保持记忆的清晰。

记忆的完整对自我尊重的民族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追溯历史的记忆,从古老的鄂温克以其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习俗、共同心理素质的群体形成之日,千百年来积累的生存经验、有关部族起源等久远信息,仅仅凭借一代又一代的口头述说顽强地存留下来。但那是一条脆弱的、锈蚀的链条,早已铸就了不可更改的缺陷,有关民族母体生成的轨迹仅以破碎的残片昭示后人,在苍茫时空中抛下了待解之谜。<sup>②</sup>

这是一本一直被批评家忽略的书,书名为《述说鄂温克》,而从上述摘录的文字里,编者对这本书的厚望毋庸多言。此书1995年初版,1998年再版。一旦以“述说鄂温克”命名并借由印刷技术的复刻与传播,古老群体的“自我保持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正常运转。

“述说”的本能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激愤的宣泄变为进入21世纪后平实的叙事,但“边缘”的敏感,捍卫族群的“自我阐释权”,仍成为乌热尔图新世纪以来“写史”系列的意脉,一直维系。从2004年的《呼伦贝尔笔记》开始,乌热尔图创作的话语内容转入族群历史生成轨迹的梳理。《呼伦贝尔笔记》以《古老的柱石》开篇,由乌尔逊河下游山岗上俗称“成吉思汗

① 乌热尔图:《弱势群体的写作》,《天涯》1997年第2期。

② 乌热尔图编著《述说鄂温克》“致读者”,第1页。

拴马柱”的神秘柱石抛出“不知何人矗立”<sup>①</sup>的历史难题,并以此为视点,前后扩展至呼伦贝尔境内的另两处历史陈迹——辽长城和女真人的“金边壕”,借助历史文献的考证和推测,勾勒出呼伦贝尔早期的历史框架。远古的北方民族(匈奴人、契丹人、突厥人、女真人)曾生生不息于这片润泽富庶的广袤土地,而今,一如这些散落在不经意处满身陈灰的古迹,被历史渐渐掩埋。由是,“柱石”的象征未尝不可理解为复苏了的历史意识,暗合了全书的叙述基调。

总起来说,《呼伦贝尔笔记》以及之后的《蒙古祖地》,均以历史地理为骨干,以文学想象为基础,融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于文本中,让读者在读“史”之外,领略鄂温克文化的底蕴。这些被乌热尔图归为“读史随笔”的短文,以族群生活情感为基础,构成了行文中的真实,这些真实,恰突显了既往史料的局限与选择。

《鄂温克族历史词语》一书的内容包括鄂温克族的部落族属、地域分布、迁徙历史、城池山河、英雄人物、历次征战、神话传说等。此书采用了词典编撰的手法,目录对鄂温克族历史地理介绍以词条的形式呈现,编者在每个词条,特别是涉及部族、城池、山河等名词,在汉字后都有相应的沃沮—通古斯语的注音;《鄂温克史稿》亦大抵如此,这两部书均采用类词典的形式,除了具有条缕明晰的工具性质外,更具有规范性,此规范性的社会意义不容小觑。

由他人所代言的历史书写,难免存在疏漏、偏颇、误读,甚至有意的遮蔽。从更大的范围来讲,人类的早期历史一度为强权而书写,所谓中华之域筦而统之的数千年历史长卷,也长期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中。这也是迫使一些群体长期徘徊于历史边缘,在人类共存的大舞台上无声无息的重要原因……本书彰显了鄂温克人的观点与情感,无疑以其视点为中心,表述了他们复苏了的历史意识。编辑这部历史阅读参考书的目的,也是向关注边疆史学的读者们集中展示一个民族的历史视野,以及他们面对断裂的历史之所思与所为。<sup>②</sup>

这无疑具有明确的历史论述的介入姿态。海登·怀特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了重新阐释,其核心思想即认为历史事实是建构出来的<sup>③</sup>,既然是建构之物,那么“每一个历史呈现都有意识形态的作用”<sup>④</sup>;佩索阿则用历史是“流动的解说”表达类似观点,即强调叙述

① 乌热尔图:《古老的柱石》,《呼伦贝尔笔记》,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② 乌热尔图选编《鄂温克族历史词语》“引言”,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

③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译本前言”,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④ 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8(5)。转引自陈芷凡《历史书写与数字传播:台湾原住民“文学”论述的两种思维》,《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者的立场和视角<sup>①</sup>,以何种“后设”观点介入历史论述。从乌热尔图 21 世纪的这类准历史写作,可以看出他在本族群文化危机中运用少数者的话语来协商、争取话语空间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他以颠覆强权历史书写的方式,以多重话语丰富单一叙事,达到彰显边缘文化质素的目的,并最终指向本族群的文化记忆问题。这种文本、意指和写作行为综合成为一种叙事行动<sup>②</sup>,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历史书写方式,杂糅了文学的虚构和历史的真实;又成为一种文化的推力,在日益加剧的本族群文化危机中寻求保存与发展的自救之路。

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本族群口头传统为基原创作中短篇小说,到 21 世纪采用颠覆性的写作策略重写民族历史,乌热尔图的创作在话语内容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之大以致于他自问“写作与思考是不是偏离了文学之路?”这是作为作家的自觉。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以偏狭的定义来规约文学的表现形式,只要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和传承性,任何形式的文学都是有益的;而少数民族作家更要从整体上把握自己所处的文化处境,以自己的创造力替补与接续世代相传的文化链条。这是写作者的文化责任。乌热尔图的创作正是在此意义上拓宽了文学之路,并有力地实践了“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sup>③</sup>。

乌热尔图的写作从更普适的意义上来说,具有弱势族群的共通性,是一种“人民记忆”。按照有学者的总结:“所谓‘人民记忆’,按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说法,乃是‘意识的历史运动’,是渗透于语言和无意识深处的,也是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是与权力/知识话语相对立的历史的探索,是民众在自己的言语中所积淀的无所不在的巨大的‘词库’。它抗拒和阻滞文化机器的意识形态对‘记忆’的控制、压制、和制度化的过程。‘人民记忆’不是完整的历史叙事,不是完整的、秩序化的、抽象化的东西,而是存留于片断、零散、漂移的能指之中的东西。对‘人民记忆’的发掘的书写是第三世界文化寻找自身话语的有效策略。人民自身记忆被压抑时,它就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处于一种‘失语症’式的焦虑之中,第三世界的人民就会如被‘催眠’一样受到控制,它找不到缝隙和孔道获得自我表述,它被莫名的恐惧/欲望所宰制。因此,‘人民记忆’就如同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结构人类学》中所指出的那种‘无能指的能指’一样,在寻找着表达的可能性。这是第三世界人民抗拒第一世界意识形态的策略。”<sup>④</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乌热尔图不仅是鄂温克作家,中国作家,更是世界性的作家。

① 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韩少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 197 页。

② 刘大先:《叙事作为行动: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问题》,《南方文坛》2013 年第 1 期。

③ 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 页。

④ 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年,第 132 页。



## 结 语

作为人数只有两百多人的使鹿鄂温克部落,其集体记忆该如何在文化危机中生存与延续?现实的转变让乌热尔图已无空间犹豫。在现实与传统的想象中,他必须扮演作为部落知识传承者的“老人”,所以不论是转型前的小说创作还是转型后的准民族志叙事行为,都蕴含着强烈的再造族群文化记忆的动机,比如《雪》《丛林幽幽》等小说中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有散落在其他小说中的民风习俗,这些都是使鹿鄂温克集体记忆的基石;再如《鄂温克族历史词语》《鄂温克史稿》中大量的对“地点”“地名”的研究,正如勒高夫所说“历史的形成起始于对集体记忆中的‘地点’研究”<sup>①</sup>。而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叙事,通过对鄂温克族群“过去”的书写,可以明白该族群的过去是如何经历的,集体记忆是如何建构的。虽然乌热尔图的叙事表面上是对过去的重现,但是,任何“过去”都是立足于“现在”的,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这是集体记忆特有的一种丰满的当下性。鄂温克民族正处于“文化的黄昏”,鄂温克民族的历史以及传统,正在慢慢消失,这样的“现在”,决定了乌热尔图在对族群“过去”的叙事中,不遗余力地追溯历史源头,“洗刷”记忆。乌热尔图清醒地看到,一旦鄂温克人失去了“过去”的意识,那么他们也就迷失了自我。就此意义而言,乌热尔图对鄂温克民族的历史编纂,既是鄂温克民族集体记忆的写照,也是鄂温克民族文化记忆的再造,这些文本唤起一种“实质”,在记忆而非在梦幻或幻想的领域内起作用,并在“实在”而非“想象”的招牌下展开<sup>②</sup>;而如今的鄂温克民族则通过这些“实在”的文本寻找到身分认同。

少数民族文学的再造文化记忆虽进行于当下,却对过去不断进行重构,并对未来产生形塑的力量。透过文化记忆,过去、现在与未来形成一种密切的联系。停留在口头的记忆终将消散;而通过叙事,记忆被整理编织,并固化为可以传承的精神遗产。不同的叙事营造了不同的记忆,并为未来提供了更加多元共生的途径。作家和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一样,都肩负有为普及社会记忆而奋斗的担子。乌热尔图追寻的鄂温克,张承志重塑的穆斯林,正是奋斗的先驱。

(陈珏,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周翔】

① 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

②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天津出版社,2005年,第13页。